

# 汾陽黨史通訊

中共汾陽縣委黨史辦公室編

在全軍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楊尚昆)

緬懷閻紅彥同志

(吳岱峰)

憶王磊縣長的幾件事

(郭忠民)

抗日烽火中興起的一支革命武裝

(任忠浩)

1985 1

# 汾陽黨史通訊

---

(不定期出刊)

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总第八期)

编辑者：中共汾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主 编：任永礼 副主编：张树森

印刷者：山西省汾阳县印刷厂

---

内部刊物 欢迎交流

注意保存 请勿遗失

## 目 录

杨尚昆同志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

### 晋西游击队史料汇集

缅怀阎红彦同志

——回忆红彦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吴岱峰(6)

丹心化碧血 浩气壮千秋

——杨重远烈士传略……………吴岱峰(11)

热血洒疆场 英名垂青史

——白锡龄烈士传略……………吴岱峰(18)

智闯三关 巧运子弹

——阎红彦、吴岱峰等同志护送子弹上山的事……………

……………靳守宽、高得胜、任水礼(24)

关于晋西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站——汾阳万义客店的调查…高得胜、靳守宽(26)

白素琴同志谈:

三十年代初阎万清在汾阳开设万义客店的情况……………(28)

### 采访纪实

郝耀同志谈:

一九三九年汾北工委和汾阳县政府的部分工作情况……………(29)

忆王磊县长的几件事……………郭忠民(32)

抗日烽火中兴起的一支抗日武装

——忆“任支队”简要情况……………任忠浩(34)

我在汾孝地区从事革命工作的若干情况……………李永书(36)

### 回忆录

• 资料选登 • 1949年我县南下干部配备花名单……………(40)

# 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

杨 尚 昆

征集党史资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而征集军史资料又是征集党史资料的重要内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了几十年仗打出来的，军史资料在党史资料中占很大比重。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有叶挺的独立团和卢德铭的国民政府警卫团，这是我们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再远一点，从孙中山开始建立军队，我们党就做了大量军事工作，黄埔军官学校就是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这个时期的历史材料也应该征集。以后，我们党建立了军队。起初很小，慢慢发展壮大，建立了很多根据地。经过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几个大的历史阶段，史料非常多，非常丰富。但是，现在我们手上拥有的却非常少。所谓少，是说能够反映军队和根据地面貌的生动资料，搜集到手的实在太少了，汇集起来的，就是十本《星火燎原》，大多是一些片断的记录，有一定的价值，但这些资料还远远说不上完备。我们现有的资料，还只是些“骨头”。如三大战役，书上写了哪年哪月，打了哪个战役，经过怎样，这都是些“骨头”。我们写军史、战史，不能只有“骨头”，还要有“肉”，要有大量的历史资料。《星火燎原》中，早期的东西多一些，近期的东西少一些，如有关三大战役的就不多，抗美援朝的就更少了。我们搞了几十年武装斗争，难道就只有这么一点资料？

征集党史资料，非常必要。现在不是要你们去写党史、军史，但是，你们要做第一步的工作，或者说打基础的工作，就是把资料征集好。有的同志说“抢救”历史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征集资料就是带有抢救的性质。写历史要靠正式文件，即党中央的电报、报告等，但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这些正式文件保留下来的很少。拿过去的电报来说，不要说一个团、一个师、一个方面军的，就是总部的，现在也找不到一套完整的，哪怕是抄件。据我所知，红一方面军长征中从毛儿盖会议到陕北这一段，资料就很少。八一电影制片厂拍《四渡赤水》，想找有关的命令都找不到，本来是有命令的，就是因为战争环境，这些东西烧掉了。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二年，党中央在上海指挥全党，这一段资料大部分也都烧掉了，留下来的很少。党中央从延安撤退的时候，也烧掉了很大一批资料。

我党历史资料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是过去共产国际保存的我党文件。那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文件，都送给共产国际，在那里保存了一部分，解放后，交回给我们几百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就是其中的两份文件。最近发现的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也是从共产国际交还的文件里找出来的。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把这个材料拿给我看，要我鉴别是谁写的。我看了不能断定。他们又拿给陈云同志看，陈云同志经过长时间辨认、回忆，肯定是他写的。正式传达遵义会议的文件，现在只有这一份

了，这是十分珍贵的。遵义会议后，红军在遵义还开过高级干部会，张闻天同志传达会议精神，毛主席讲了话。现在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资料，毛主席的手稿里也没有，据我回忆，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主要思想，在遵义会议上就讲了，但现在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资料。

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任务是很繁重的。你们这个工作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要广，二要专。广，是指所有的资料，即使是一点线索，也要想方设法加以搜集，包括健在的老同志和他保存的资料，前不久，美国《纽约时报》前副总编索尔兹伯里要写长征，从遵义到甘肃，红军长征的路线他都走了，路上还遇到好几个老红军，这些老红军是当年负伤留下来的战士或基层干部。他在乌江边还发现了当年为红军撑船的艄工，带路的向导。让这些人写长征或写某个战斗，他们写不出来，但他们可以提供一些生动的历史材料。请你们去找一找这些线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无非是在南方那几个省：湖南、湖北、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四川等。朱总司令的老家四川仪陇县还有当过红军的人没有？我估计还有，大概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人了。这些地方也请你们去征集一下。不需要去很多人，派个把人去调查访问，人家知道多少就写多少。一些老根据地和红军走过的地方，还保留着一些标语，索尔兹伯里在川西阿坝一带，就发现了一些。有的老红军手中还保存着一些资料。这次看到同志们征集到的部分文件资料，都很珍贵。这些东西应当继续征集，我想还会征集到很多。上面讲的是要广泛征集。

在广的基础上还要专，也只有广的基础上才能专。专，就是要有重点，搞专题。比如红二方面军，就要搞清贺老总是怎样从湘西发展起来的，他后来在湘鄂西搞到什么规模，等等。贺老总早年当过湘西镇守使。我们的高级将领里还没有当过镇守使的人。你们不是列了很多专题吗？这就是“专”。专题，无非是一个根据地的专题，或者一个事件的专题。三大战役是我们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是非常重要的专题，现在还没有占有详细材料。写三大战役，不能象写党史、军史那样一般地写，而是要写清楚每个战役的经过、各个阶段部队是怎么打的，这需要更加丰富的材料。东北抗联，也是一个专题。还有很多没有搞成的武装起义，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如河北的高阳、蠡县起义，当时也建立了红军。陕北也有这样的起义。四川有刘帅领导的顺庆、泸州起义。江苏也有，是陈云等同志在那里领导的。一九三一年我在江苏省委时，徐州、海州、蚌埠这一带，就有农民武装，刘瑞龙同志当时是徐海蚌的地委书记。除了三大红军主力外，还有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十五军团，陈先瑞同志领导的陕南的一部分红军。再就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陕北来讲，刘志丹、谢子长他们也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搞起来的。象这些史料，现在有很多都不完备。要把这些专题的有关资料都收集起来。“文化大革命”以前，毛主席就指定了一个党史起草委员会，董老是书记。“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工作给耽误了。“文革”前，我在中央办公厅，根据中央的决定，为了给将来编写党史提供研究资料，印了一些中央文件汇编，还出了一个抗美援朝的中央电报专辑。“文革”中，因为这事还给我加了两条罪名，第一条说我“偷窃中央文件，扩散机密”，第二条说我“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现在看来，我当时编少了，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编。“文化大革命”损失了不少历史资料，老同志保存的毛主席的信，他们和中央往来的文件、个人日记，有许多被烧掉了，自己没有烧的，也被红卫兵抢去烧了。这个损失很大。今

后,你们还是要广泛地收集,在广泛收集集中搞好专题征集。南方几个大军区把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作为一个专题进行征集,这是对的,是应该的。

从抗日战争开始,也可以说从长征结束开始或再早一点,中国革命战争的重心就由南方转到了北方。建立根据地来讲,有一个南方根据地时期,有一个北方根据地时期。从干部情况来讲,老一点同志,多数是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四川的也不少,抗战以后的干部,则多数是河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的。这还不算东北抗日联军和广东、福建。刚才我看到你们征集到的东北抗联的照片,是很珍贵的,我一眼就认出照片上的周保中。现在军队中各种资料要广泛征集,包括“活资料”,也包括“死资料”。“死资料”就是留下来的历史文件资料和各种文物,包括红军留下来的标语。还要找些见证人。总之,征集任务繁重,范围很广,工作非常重要。

将来写历史,不能只靠干巴巴的几句话。象现在有的党史本子,写红军长征和根据地,都是提那么一两句,这是不行的。要用生动的党史资料,对我们的青年,包括军队里的青年战士和干部进行教育。这些青年战士、干部,他脑子里比较深刻一点的东西就是“文化大革命”。至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情,军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等等,他们根本弄不清楚。因此,要用党的历史对他们进行教育。

当前的征集工作,就是为将来写党史、军史收集材料,现在还谈不上正式写,也还不是出书。明年专题资料能不能出书,还要研究。其中涉及到重大的问题如何评价,要由中央讨论后才能下结论。我最近看了一篇有关叶挺同志的回忆录,讲他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的情况。新四军被敌人包围后,叶挺同志为了挽救剩下的一百多人,带几个人下山去跟国民党交涉。他那时是蒋介石正式委任的新四军军长,又是著名将领。他相信可以把这部分人救出来,没有想到蒋介石敢抓他。可结果呢,一下山就被蒋介石扣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对叶挺怎么估价?我认为这是他应有的行动。因为部队打散了,饶漱石化装成连的文书跑掉了,叶挺同志没有别的办法了。又如,对林彪怎么估价?林彪在东北那一段,除了在若干问题上与毛主席相对立外,包括进关,一直打过长江,打过海南岛,应该说,肯定的方面不少。不能因为他以后叛国了,就说他从东北起就一坏到底。无论如何他还是红军的一个战将,他是打了不少仗的。对这样一些人物作历史的评价,要由中央来讨论。

过去,对有些烈士有争论。现在有的恢复名誉了,有的还没有作结论。如红七军的李明瑞,现在纪念百色起义,给他立了一个碑,就把他的名誉恢复了。中央苏区的季振同究竟应不应该杀?季振同是二十六路军起义的,以后怀疑他要把队伍拖走,就把他杀了。这些事情不是仅用哪一个人的回忆录就能做根据的,要历史地评价。

我还说说另外一些人的情况。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什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龚楚叛变不好,但对他在红军那一段表现如何看?还有个叫何涤宙的,他原是国民党陈时骥部的工兵主任,五次反“围剿”被红军俘虏后,我们把他留在红军大学教学,后来一直在总部当参谋,参加了长征。到瓦窑堡时,根据中央内定的凡

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可以入党的精神，发展他入了党。但西安事变后，他去西安时却叛逃了。又比如一一五师有个参谋长叫周昆，是林彪的老部下，抗日战争时他在洪洞，从国民党那里领了几十万元法币，开小差跑了。象这样的一些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可以不作历史的评价。涉及这些人的资料可不可以收集？当然可以收集，因为他们有一段参加革命的历史。他们叛变革命的事实当然也是抹煞不了的。但对项英这样的同志，还有张国焘这样的人物怎么评价？我认为应该摆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评价。象刚才说的林彪，就不能说他从头到尾都坏。前些时候，东北的同志拍电影，排戏，就不敢写林彪。陈云同志不是说了吗？对林彪应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来考察。涉及这些人的有些重要历史问题的结论，不是你们能作的，要由中央来作。那是将来的事。

同志们，现在主要靠你们组织人，广泛而又有重点地征集资料，不是让你们写历史。写历史要各方面都站得住，评价要公道，光靠你们不容易办得到。

现在大批退下来的老干部都可以写一些材料。写材料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写史料，不是回忆录，不准备印，也不准备出版；一种是写他自己的回忆录。说到回忆录，我觉得问题比较大。邓小平主席就讲过，他不写回忆录。当然，他是因为工作忙而不写。我看到一些回忆录，里面有些史实，但也有些东西不真实。其原因不外是两种，或者是不了解情况，或者是不实事求是，甚至故意夸大自己的作用，借写回忆录把自己当时的作用、地位和觉悟拔高，这就不好。现在的个别回忆录，的确有这种倾向。

出版回忆录不要看成是小事。我不主张大量出回忆录，而是有重点地出。要大体符合历史，正确，公道。一句话，要实事求是。但是不妨动员所有能写的同志都来写，写了你交给我嘛！正式出版要给稿费，写出来的回忆录不一定都出版，但也可以给点稿费。

至于给党的领导人立传，这个问题就更严肃了。中央决定，在军队中只有几位老师可以立传。其他人写传当然也可以，写了作为材料放在那里。

给领导人写传的问题很复杂，不要看得简单。这里必定牵连到很多带全局性的问题，你说不清楚。请你们无论如何要注意，如果收到了什么人写的传记，或者你们组织人搞的，不要輕易出版。否则各说各的，就会引起很多无谓的纠纷。

出版回忆录要慎重，出版传记更要慎重。中央决定的几位老师的传记一个都还没有出，这两年内也出不了。写传记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写得很好，各方面都很满意，还有中央的一关呢。几个老师的传，将来要经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查。请你们注意：收集几千万字的资料都可以，这是为将来写党史、军史或某根据地史作的资料准备，但不要轻易发表。因为发表了就容易引起很多问题。如果是稍微有点名气的人写的东西，人家就更认为是“权威”，就会作为根据，就很可能把历史搞乱。关于全党、全军的一些重大问题，只有中央讲了话，才算定论。

《彭德怀自述》是一本好书，但是不是每一件事彭德怀同志都忆述得恰当呢？他那时手头一点材料都没有，完全凭自己记忆。他的记忆力是了不起的，但时间长了，不要说年月日记不准了，就是一些人和事也记不清了。所以完全根据《彭德怀自述》写军史肯定不行，因为有些地方他记错了。最近出版了聂帅的回忆录，第二册也快出了，是很好的材料。李维汉同志的回忆录，中央好几位同志都看了，认为他写的不错。第一，他实事求是；第二，他

把自己摆进去，这就很有教育意义。这个老同志今年八十八岁，原来立下志愿，进入八宝山以前，把几个专题写完。他不是写自己的传，而是写专题。现在他还没有写完。李维汉同志是个很好的党史教员，他很长时间在党中央担任重要工作，他担任过组织局长，大革命时期很多重要会议他都参加了。这样的老同志，我们党内不多了。

历史上都是后一朝为前一朝写历史，明朝的历史是清朝人写的。前人死了，他要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现在不能这样。我们要广泛搜集资料。写出我们经历过的这段时期的历史，让年轻人知道这段历史，也让后代人有可靠的根据，继续研究这段历史。现在许多年轻人只知道“文化大革命”。大单位整党办公室主任和联络员会议上反映：有个战士，“文化大革命”时才三岁，现在二十几岁，他在日记中写了两条：第一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第二条，现在掌权的都是“走资派”，应该打倒。“文化大革命”时他才三岁，还没有资格当红卫兵，他晓得什么？这两个错误观念是在他成人以后，至少是在十七、八岁以后这三、四年时间中形成的。余秋里同志讲，不要把这个人开除，要留下来当个典型，认真研究一下：他怎么会受这么深的反面教育和影响？为什么当兵几年了，军队的正面教育根本没有接受？如果这个错误的观念不给他纠正过来，将来他要是当上了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怎么得了啊？！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历史材料对青年进行教育。当然细节不可能都搞得那么完善，但大的方面无论如何要准确、一致。不能各说各的。如果以后各根据地、各野战军，各写各的历史，互不联系，互相矛盾，在大的问题上有分歧，就不能作为正本去教育青年，教育我们的后代。

在党史、军史方面我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也只是一般的。至于具体的，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我就不很清楚了。现在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几个方面军、各个根据地的情况，主要靠搜集资料。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最后要由中央来审定。中央要根据各种历史材料来判断。鉴定历史不象看照片，照片上是周保中，就不会变成李保中；文字材料不同，有可能又是周保中，又是李保中，究竟哪个正确，要进行判断。

这里要讲讲有关纪律的问题。现在有个别同志去参加编写或整理史料的工作，他把一些材料据为己有，写成文章去发表。这是不允许的。这些材料都是大家收集起来的，不能垄断在个人手里，或者不经过一定的手续自己拿去写文章，这是个纪律问题。档案馆的材料，也要按照档案馆的规定来使用。

最近有人向我反映，说中央档案馆卡得太严了，不准看档案材料。这也得从两方面看，他卡得太严是事实，可能应该放宽一些，但档案馆如果把关不严，出了问题，他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所以这一点请你们理解，并且要把好关。你们现在主要还不是看档案馆的东西，而是广泛收集资料。当然档案馆的东西应该看的，还是要看。去看就要遵守纪律，不许抄的不要抄，该保密的要保密。摘录、复制的档案材料是给组织的，不是给某个人的。

同志们从事的这项工作很重要。第一，任务很重；第二，政治责任很强。所以一定要严肃对待。不要轻信某一种材料，要广泛搜集，认真核实，全面研究。现在主要是处于征集材料的阶段，不是写历史和出版阶段。一些大的原则问题，要由中央来决定。

我就讲这些。

- 原载中央《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

# 缅怀阎红彦同志

## ——回忆红彦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

吴岱峰

阎红彦同志，是晋陕甘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和红彦同志在红军晋西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一起工作和战斗，是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显示出坚强意志和革命胆略，他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每当想起他对党赤胆忠心，对革命坚毅忠贞，敢于赴汤蹈火的精神，想起他耿直刚正、光明磊落，对敌人横眉冷对，对同志诚挚相待的高尚品德，真是情更深，意更切，怀念无止息啊！

### 红旗插上吕梁山

大革命失败后，红彦同志在陕北继续坚持斗争，参加了一九二七年的清涧起义。虽说起义失败了，但血与火的锤炼使他更加坚强。一九三〇年，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红彦同志和白锡林，李成兰等同志带领一个武装小组到晋西汾阳、孝义、中阳县一带开展革命活动。我是在第二年春上，由省委派到游击队的。

当时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阎锡山上台，冯玉祥、高桂滋等部退入山西，大小军阀之间矛盾很多，连年的战争和残酷的压榨搞得民穷财尽。以刘天章同志为首的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开展游击战争。省委听取了阎红彦同志的汇报，认为晋西吕梁山区各县人民受害最重，怨声载道，当时又有驻在汾阳的冯玉祥部教导团内地下党的关系，省委决定以太原兵工厂调来的膺子南等，陕北调来的阎红彦、白锡龄等，从高桂滋部调来的拓克宽、杨重远、胡廷俊等这批党员为骨干，建立晋西游击队。

红彦同志回来向我们传达了省委指示：以毛泽东同志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为榜样，开展游击战争。红彦同志不畏艰险，善于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斗争手段，巧妙地通过敌人的层层哨卡，往来于吕梁山区，汾阳和太原之间，胜利进行组织联络工作，把上级调来的人员和零散的武器安全运送到山区。红彦同志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和晋西各县地方的联络情况，及时提出在汾阳的游击队人员应迅速进山，同时加强党的领导，充实骨干。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在孝义、中阳、汾阳县的边境大麦郊娄底村，※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成立。拓克宽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阎红彦、杨重远分别任副大队长、副政委。从此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诞生了，标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插上了吕梁山。

## 游击健儿逞英豪

在晋西游击战争中,红彦同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事迹,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影响,为青年后辈留下了可贵的史料。

游击队进入汾阳、孝义、中阳交界的地区,群众反映这里有个姓武的恶霸地主,依仗儿子当山西伪财政厅长的权势,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群众对他切齿痛恨,要求除掉这个地头蛇。经马佩勋同志详细侦察,队委会认为,处决此霸,对游击队在这一带站稳脚步,发动群众,至关重要。谁知这个恶霸听说红军要来,早已逃往百里以外的张兰镇了。张兰镇在平原地区,有重兵驻扎,碉堡林立,封锁得十分严密。红彦同志决定深入虎穴,智除恶霸。他带领三个同志,在农民协会的协助下,摸清了那个恶霸的根底,然后装扮成一行拜会高朋贵友的模样,迂回通过一条条封锁线,一道道岗哨,来到远离游击区的张兰镇。这个地主做梦也不会想到游击队在这里突然降临。当红彦同志的手枪对准他时,他吓得魂不附体。此人被押到游击区后,开了个群众斗争大会,并限令他家如期退还剥削农民的地租、高利贷。最后在群众的要求下,处决了这个恶霸。此一举震慑了土豪劣绅气焰,不少贫苦农民自动来参加游击队。

为了扩大部队,游击队和白军中的地下党员冯金福一起策划了汾阳永安镇敌军一个排的起义。当条件成熟时,队委会决定,由红彦同志和白锡林、胡廷俊等同志前往策反接应。他们在永安镇用了三个昼夜进行秘密接触、联络,终于在四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发动了兵变。随即起义士兵带往游击队。不料在途中发现有敌军跟踪追击,一部分起义士兵十分恐慌,其中一个猛然把枪口对准红彦同志的胸膛,破口大骂。刹那之间,情况变得十分紧张。红彦同志却泰然自若,严肃而冷静地对他们晓以大义,使之自动把枪放下。当敌兵追来,红彦同志又迅速组织迎击和转移,终于把起义部队全部带到了游击队驻地。

游击队在山区活动,补充枪支弹药十分困难,一支枪,一发子弹,往往要用鲜血换取。初秋时节,太原兵工厂地下党组织给游击队搞到两千发子弹,红彦同志负责要设法把它转运到汾阳县城,但是县城到游击队所在地柳树湾还有二百多里路程,敌人三拦五卡,戒备森严,又有保安队频繁往来,风险很大。

红彦同志身穿月白色绸大褂,戴着墨镜,洋草帽,躺卧在一乘骡轿里,子弹全部藏在轿子底层的草堆里,由冯玉祥部教导团里一位地下党员护送出了北城门。我和符有坚、田有辛、魏明四同志各带短枪在城外庄稼地里等候。见骡轿到来,便前呼后拥地随行。翻过一座高原,到了向阳镇,正赶上个集日,只见巡警四处活动,路口遍设哨卡,气氛颇为紧张。同志们沉着坦然地走进一家客店吃饭。突然,一个巡官带着一些人蜂拥而至,气势汹汹地盘问起来,红彦同志一一从容对答。巡官走到骡轿跟前要动手检查,我们的心都吊了起来,准备着一场厮杀。但红彦同志仍十分镇静,摆出一副大官势派,说:“没有带什么东西,就是几条被褥”。那巡官将被单一揭,没有看到什么也就走了,中午我们到了向阳沟,红彦同志又

沉着机智地应付了另一支巡逻队。午后，越过吴城岭，远远望见吴城镇外路口聚集了不少人。一打听，原来镇上今日逢集，巡逻队对来往行人严加盘查。为了避免造成损失，我们便绕了道，月夜攀山越岭，赶第二天天黑之前，将子弹全部运到柳树湾。

利用游击战的间隙，红彦同志还经常给指战员宣讲一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政治思想和游击战的道理。在他的建议下，部队还开展了反流寇思想的斗争，跟群众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很快地部队发展到一百多人，在晋西吕梁山部分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战斗连连取胜。于是这一带各级伪政权接连向省里告急，太原的报纸也经常登载游击队的消息。当时的伪山西省主席商震，被他的政敌列数的十大罪状中，有一条就是“红军晋西游击队到处活动，商震束手无策。”当时，红彦同志去太原，听到这些消息，并向省委汇报，但也预感到情况很快会发生变化。

## 依靠群众西渡黄河

徐永昌取代商震上台不久，果然派出一个师、一个炮兵团和地方团队共万余人，气势汹汹地前来“围剿”晋西游击队。敌军在高山路口都设有哨卡，他们节节进逼，步步为营，一面紧缩包围圈，一面进山大肆搜查。

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游击区逐渐缩小，游击队不能进村，群众也无法上山，大家不得不采食野菜、山果充饥。同时，山西省党组织遭到破坏，游击队又失去了跟省委的联系。在这关键时刻，有的同志悲观失望，主张埋枪散伙，待机再起；个别人主张跟敌人死拼，红彦和部分同志则根据省委预先关于必要时可西渡黄河的指示，坚决主张西渡黄河，转战陕甘。红彦同志分析情况说：“第一、有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在农村党的群众基础好；第二、西北地区辽阔，敌军中有党的秘密组织……，这些条件都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他还谈到如何克服突围和西渡黄河的困难。经过激烈的争论，大家一致同意红彦同志的意见：西渡。

接着，游击队从人迹罕见的深山里向西移动。一天深夜，部队在高山岭上迷失了方向。正当大家焦急时，蓦地发现山坡下边有火光。红彦同志和杨重远同志过去一看，是一位老乡。老乡一见面就亲热地叫红彦的名字，拉住红彦同志的手说：“我叫老郭，我认识你，你是游击队，老百姓暗中保护着你们红军呢。那边亮灯的地方有白军，这里路口、山顶都有他们的哨兵。”接着他用手指着前面说，走出这条石沟口，攀上陡山，就突出了重围。

按照老郭指的路线，我们跨沟越壑，搭人梯，上峭壁，终于把“围剿”的敌人远远甩在后边。第三天就看到了咆哮翻滚的黄河！这时全队只剩下三十人，这三十人都是共产党员，是经历了严峻考验的红军骨干。

船都被敌人控制起来了，搞不到船，也找不到水手，队员们在石穴里潜伏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当大家十分焦灼的时候，红彦同志领着王怀安等六名当地的水手，带着些羊皮筏子来了。第一批人送过河去。到了第二批，红彦同志和我们十几个人渡河时，突然，激流把系着油篓的绳子冲断了。油篓里装的是冲锋枪和子弹，是战友们的鲜血换来的。会水的同志当即下水搜寻。与黄河搏斗了整整一夜，三十人全部带着武器上了西岸。

## 驰骋陕甘高原

游击队到陕北后不久，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分别继任大队长、副大队长和政委，很快就与中共陕北特委取得联系。特委先后调一批共产党员并动员了一大批革命青年来游击队。这支队伍迅速壮大，还扩建了骑兵，使战斗力大大加强，以新的英雄姿态驰骋在陕甘高原上。

短短的两个月之内，游击队接连打胜仗。在保安县（今志丹县）安条岭，同敌高玉亭营和团匪的步骑四百余人深夜遭遇，敌军南北夹击，红彦同志身先士卒，把敌人打得人喊马叫生俘其一部。在安定县（今子长县）营盘山与敌万宝山营激战，大胜敌兵，缴获枪支五、六十支，子弹数千发，俘敌四十余名。对俘虏，愿留者，欢迎；愿回家的，发给银元两块；还把敌人的伤兵送回去，这样贯彻党的俘虏政策，在陕北还是第一次。农历八月二十五日夜，地方党送来情报说，驻扎在瓦窑堡的敌人，约一个骑兵排来到玉家湾，自吹兵强马壮、精锐异常。游击队星夜急行军，于拂晓时分向敌人发起突袭，一举全歼。当天中午一度进攻瓦窑堡，使敌威风扫地。

一九三一年农历九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西进到甘肃合水县南梁堡林绵庙和刘志丹同志会合了。十月初，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同志来到南梁堡领导红军游击队。根据省委指示：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等七同志组成队委会（党委），谢子长同志任队（党）委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省委曾指示成立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后来为了坚持建立党领导的独立武装，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同志都曾担任过总指挥。

陕甘游击队于一九三二年二月正式成立。在谢子长同志指挥下，打下了旬邑县职田镇，建立了农民协会，逮捕了土豪劣绅，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在敌人营垒中引起了很大震动。敌人调集重兵，向红军进攻。在阳坡头战斗中，当敌人凌晨迫近我阵地紧急关头，红彦同志率领突击队猛攻敌人侧翼。他身先士卒，带头冲上前去。部队迅速全线出击，大败敌人，打了一个以少胜多的漂亮仗。这是陕甘游击队第一次与敌人交锋。接着在四村原建立了农民协公、农民赤卫军和各种群众团体，扩大了游击区。

游击队里有十余名小战士，红彦同志自愿负责编了一个童子班。他说：“我们这些人今后不是战死，也要老死，这些娃娃就是我们的接班人。”他给童子班讲军事、讲政治。在宜君县艾蒿洼战斗中，他指挥童子班打退了主攻的一路敌人。不久，谢子长同志在军人大会上宣布，童子班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少年先锋队的诞生，吸引了更多青少年参军。

后来谢子长同志调往甘肃工作，游击队东进韩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战斗受到一些

挫折后，回师到甘肃宁县一带。当时，有些同志产生了悲观情绪，有的要南下到平原地区采取“昼伏夜出”的游击战术打游击，多数人要求北上开展游击活动。部队面临分裂危险。恰好红彦同志从黄龙赶回部队。他坚决主张就地展开游击战争，他认为必须以革命利益为重，维护部队的团结一致。他讲得有理有力，全体指战员都很信服，使部队重又恢复了战斗力，这就在关键时刻挽救了这支部队。

一九三二年八月间，省委派来一位同志作陕甘游击队政委。他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违背党的组织原则，非法搞宗派活动，无情地斗争和排斥打击原红军中一些老干部。弄得大家人心惶惶士气低落。在敌人包围下，他要部队坚守阵地，限二十天内分配土地完毕，并下令攻坚，致使部队连吃三个败仗，伤亡惨重。红彦、杨重远等同志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他们这一次篡夺游击队领导权的企图没有得逞。不久，省委调谢子长同志第二次任总指挥，与志丹、红彦同志一起整顿了部队，继续展开游击战争，获得一些胜利。

一九三二年底，陕甘游击队在宜君马兰川杨家店，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它为后来西北红军和扩大陕甘边苏区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三年春，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部队，自行宣布兼任第二十六军政委，第二团政委，完全控制了领导权。他推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三同志加上什么“上山主义”、“流寇思想”、“逃跑主义”等莫须有的罪名，并以调送中央受训为名，赶走了谢子长、阎红彦同志，留刘志丹同志降职使用。子长、红彦被迫离开部队，但他们在北方局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红军陕甘游击队和苏区，经过严重曲折，在党的陕甘边特委领导下又逐渐恢复和壮大起来。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事情过去五十年了，当我重温那艰苦年代的战斗生活，越发感到红彦同志在关键时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遇事能抓住要害，以理服人。他为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悼念红彦同志，一定要在新长征中，为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英勇献身，努力奋斗。

（原载1980年6月23日《山西日报》）

注：※、根据吴岱峰同志1984年9月回吕梁考察回忆，确定晋西游击队成立的时间为1931年5月上旬。晋西游击队成立的地址应为交口县辛庄（原属隰县）。

※、根据吴岱峰同志1984年9月回吕梁考察回忆，确定汾阳永安镇兵变的时间为1931年6月中旬。

# 丹心化碧血 浩气壮千秋

## ——杨重远烈士传略

· 吴岱峰 ·

**编者按：**杨重远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和陕甘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建人之一，在创建晋西游击队时期，他在我县有过重要活动。尽管他一生中的其它活动不涉及我县，但为了全面整理他的事迹，以彰先烈，我们还是将他的生平传略全文刊登。

杨重远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和陕甘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之人，他曾先后担任过党的地下军委书记（在白军四十七军），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党总支书记和政委，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参谋长，红军陕甘游击队参谋长，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等重要职务。他是意志坚强、无私无畏、智勇双全、英勇善战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是深受人民爱戴的优秀共产党员和人民的忠实儿子。他把一生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献给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 痛打恶霸救民妇

重远同志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麻地沟的一个贫农家庭。幼年丧母，十三岁时父亲也病故了。从此，他揽长工十余年，饱尝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之苦，痛恨黑暗的旧社会，渴望受苦人有个出头的日子。他只身反抗多次，终未改变作牛马的命运。在“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下，他为寻求解救受苦人的道理，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陕西省立绥德师范附设的平民夜校学习。马列主义的甘露注入他的心田，使他心明眼亮，精神振奋。他凭着自己只上过几个月私塾的文化水平，如饥渴地吮吮着革命思想的乳汁。他常常在夜深人静之后、掩窗闭户、通宵达旦地苦读革命书刊，在书刊上圈点勾划，在本本上写下密密麻麻的笔记。他在马列主义的哺育下，阶级觉悟迅速提高。

一九二四，绥德县城的劣绅“高大老爷”的大管家，抢占农妇，无人敢管，重远不畏强豪，挺身而出，他组织一些青年和学生，冲进高家大院。大管家威吓道：“姓杨的、你好大胆，高府是半个衙门，你竟敢聚众闹事，不要命了！”重远斩钉截铁地说：“我既怕就不闹，既闹就不怕。别说你这条狗，就是你家大老爷我也想教训他一顿呢！”青年和学生为重

远的指挥下，狠揍大管家一顿，救出被欺凌的民妇。此举震动全县，大快人心。群众称赞重远是英雄好汉，反动当局却以“通匪”嫌疑要辑拿他，党组织立即将他安全转移。通过这件事，重远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民众的联合，才有民众的出头之日。随后，他与绥师学生一起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一九二五年杨重远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卖地负债闹革命

一九二六年，党组织派重远打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旅搞兵运工作，经该部地下党领导人李象九和谢子长同志，给他安排了个八连连长的合法职务。他到连队立即开展工作，宣传革命思想，严明连队纪律，发展党的组织，关心士兵疾苦，组织他们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他以身作则，率先躬行，在连里威信很高。由于他卓越的工作，这个连队很快就成为党在石谦旅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为进一步扩充革命势力，为武装起义创造条件，这一年，重远携带巨款，前往绥德等地买枪买马。有亲友对他说：“你家一贫如洗，你干的事朝不保夕，何不用身带之款，给家里买些窑地，以防身后不测。”亲友的“好意”，重远是理解的，自他离家去闹革命，妻子刘恩培（一九五四年当选县人民代表）拖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靠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孩子相继患病，死去活来，无钱医治，便把富人家倒在垃圾堆里的药渣拣回来，给孩子治病。一家人贫病交加的苦日子，他比亲友们更知底。但是，他对亲友们说：“我提着脑袋闹革命、为的是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不是光为自己的小家庭。我带的钱是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分一文也不能留。”重远不但未给家里留下分文，而且为了多买些枪支和马匹，公款不足，他索性卖了老家仅有的两垧山地，又以个人名义赊借了商号的银洋六百多元和一些货物。他回部队之后，债主们时常上他家催债，亲友们感叹地说：“重远卖地负债，贴上钱闹革命，他跟共产党真是铁了心。”

## 清涧起义打先锋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着祖国大地。陕北军阀井岳秀也向革命者挥舞屠刀。这时，井岳秀的旅长石谦，与井互相倾轧，矛盾日益深化，井借口石不镇压共产党员，而将石谦暗杀。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唐澍和白东亭同志来石旅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武装反抗军阀斗争的指示。地下党认为，在石旅我党地下力量基础较好，在李象九、谢子长同志领导下，发展了大批共产党员，他们对有进步思想的士兵做了大量的工作，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这些人对军阀的压榨心怀不满。我党利用井暗杀石后，敌人企图镇压石旅的共产党为理由，即采取果断措施，发动起义。重远同志在唐澍、李象九、谢子长、同志领导下，积极参与清涧起义的策划和组织工作。他所指挥的八连，党的力量强，装备充足，斗志旺盛，成为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十月十二日宣布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革命武装斗争

的第一枪，震慑了西北的统治阶级，重远率领八连，一马当先，向南进击。在延长、延川和宜川等县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战，指挥得当，克敌制胜，配合兄弟部队击溃顽敌，取得革命武装会聚宜川的重大胜利。

后来，由于敌人强大兵力的围攻，我军终因寡不敌众，遭受失败。清涧起义揭开西北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在政治上发生了深远影响，在军事上取得了实践经验。重远同志在这场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对因失败而灰心丧气的同志说：“起义虽然失败，但决不能泄气，失败是成功之母，武装斗争必须坚持下去，革命一定会胜利。”

## 冀鲁兵运树功勋

一九二八年，中共陕北特委派重远利用社会关系去河北省遵化县，打入国民党四十七军（高桂滋部）、任党的地下军委书记，合法身份是该军刘捷三师的副官长。他任军委书记的九年中，积累了丰富的兵运工作经验，成为深受党的信赖和同志们敬佩的领导者。他有很强的组织才能，又会做宣传教育工作；他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培养革命的政治和军事人才，在不长的时期内，建立起营连党支部，几年中发展党员百余人，他待人谦虚诚恳，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在同志们心目中，他既是领导者，又是贴心人；他不失时机地组织多次合法斗争，使党的力量得到锻炼和壮大，他重视学习井冈山斗争经验，曾亲临喜峰口、热河一带、侦察长城线上的地形，准备策划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爆发，高部编入第五路军序列，南调山东。重远与山东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展了峰县、枣庄一带的革命活动。一九三〇年，蒋、阎、冯军阀混战开始，高桂滋密谋反蒋败露，高部八百里防线地被围困八个月之久。驻防临沂、枣庄的高部刘捷三部退入沂蒙山区。重远与拓克宽、胡廷俊、吴岱锋同志，利用有利时机和有利地形，策划了沂蒙山区的武装斗争。

一九三〇年夏，重远突破中央军的重重封锁线，化装前往北方局汇报工作。北方局派重远以探亲为名，护送党的重要干部李杰夫（后叛变）和乔国侦同志前往陕北工作。在绥德他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举行的合龙山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高部兵运活动情况。重远的家亦成为出席会议者秘密活动和隐藏武器、文件的场所。

在党的领导下，重远在高部兵运工作中发展培养起来的大批党员，后来一部分成为红军晋西游击队的基本队伍，另一部分参加了晋东平定起义，成为赫光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四军的骨干力量，重远同志为我党早期建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吕梁建军战旗红

一九三〇年秋，蒋、阎、冯混战结束，高部退集山西省平定县听候整编。同年冬季，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开展武装斗争，先后调杨重远、拓克宽、胡廷俊等同志和陕北特

委派来的阎红彦、白锡林同志为领导核心。重远同志任支部书记，并担任为建军需要而设立的汾阳联络站主任。联络站为往山区转运人员、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做了大量工作，为晋西游击队的正式成立，创造了充分条件。

一九三一年五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在交口县（原属隰县）辛庄举行成立大会，重远任党总支书记（后任政委），他带领全体指战员，面对队旗庄严宣誓。从此，吕梁山举起第一面绣着镰刀斧头图案的革命旗帜，诞生了第一支由我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重远还配合地方党，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中旬，策动驻汾阳永安镇晋军一个排起义成功，进一步扩大了红军晋西游击队武装力量。

重远同志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审事决策更加深谋远虑和刚毅果断了。他作为晋西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之一，为这支红色武装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重远同志重视部队的政治素质。建队之后，他立即提出整顿和训练部队的计划，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他注意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骨干模范作用，他苦口婆心地进行思想工作，特别重视启发收编“土客”的阶级觉悟，通过一系列的组织教育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重远同志重视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搞好军民关系。他经常教育队员，群众是革命之本，离开群众革命武装便不能生存和发展。他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宣传动员工作，建立起以西宋庄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组织起贫农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和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开展抗粮、抗税、抗款和抗捐等斗争；办起列宁小学和农民夜校。他带领指战员、经常帮助群众送肥、翻地、播种、打柴、担水、扫院；与当地群众建立起深厚的军民情谊。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他与农会干部一起商量，有计划地组织斗争，公平合理地分配胜利果实。群众爱戴他，称赞他说：“游击队有个杨公道”。军民关系斗争中得到发展，有二十多个青年农民参加了游击队。在根据地群众的支持下，游击队迅速壮大起来。

重远同志重视总结战斗经验，提高战斗力。他作为一个指挥员不但在各次战斗中，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而且经常与其他领导干部总结战斗经验，研究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使游击队在许多重要战斗中出奇制胜。一九三一年盛夏的一天，晋军一个连进驻水头镇，妄图围歼我游击队。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有的同志提出，在敌军必经之路设伏消灭敌人。重远根据以往战斗经验，认为这种办法已用多次，敌人容易觉察。他主张部队疾进水头镇，在敌人必经之路设伏，出其不意，突袭敌人。队委会采纳了他的意见后，他又亲自化装侦察，选择有利的伏击点。战斗打响之后，敌人昏头转向，乱作一团。我杀伤敌一部，俘虏敌大部，缴获全部弹药武器，一举粉碎敌人围歼游击队的计划。这一胜利使游击队士气大振，群众情绪高涨。大家称赞重远是“政治强、军事精、能文能武，文武双全的好领导”。

一九三一年秋，当晋西游击队面临百倍于我之敌的“围剿”之际，山西省委为保存和发展这支武装力量，指示游击队西渡黄河，转战陕甘。重远、红彦、锡林和廷俊等领导同志，坚决执行省委指示，率领游击队突破敌人重围，渡过黄河、到达陕北，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